

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编纂体系建设： 历史回顾与现实重构

徐 勇

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中，文学选本的地位相比古代大大下降，但其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选本编纂实践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它除了具有一个时代文献资料的保存记录和文学经典化的功能外，还常常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接参与到文学的革新和文学现场的建构中去，在经典的传承与重构、文化认同的塑造和社会共识的构筑等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选本编纂一直以来受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对其当代流变的梳理与考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 选本编纂 体系建设 当代文学

作者徐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4-0142-12

虽然说，文学选本的地位自近现代以来有大幅度的下降，现代以来的文学选本也不再像古代文学选本那样为研究者们所聚焦，但并不意味着选本已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当代中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选本出版可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本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其意义不可小觑。仅以《中国文库》为例，“文学类”系列“第五辑”28种书目中选本就达21种之多。这是就选本出版的数量而言。现代以来，选家编选选本的热情并没有下降，相反，大凡文学文化名家普遍都有一种“选家情结”。鲁迅、郭沫若、龙榆生等现代名家自不必说，当代名家，比如说季羨林、谢冕、严家炎、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黄子平、陈晓明、王兆胜、程光炜、孟繁华、蔡翔、陈子善、李敬泽、吴义勤、吴晓东、张清华、吴亮、程德培、张颐武、贺绍俊、蓝棣之、洪治纲、谢有顺等等，皆有过编选系列选本的经历，而且大多乐此不疲。“选家情结”的出现，充分说明了选本编纂的巨大诱惑及其深远影响。

与选本出版繁荣盛况相伴随的，是选本体系制度建设的良性发展。相比古代和现代时期，当代中国的选本编纂已显示出体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发展态势。对于如此浩繁的选本出版和日益完善的选本编纂体系，建立一种当代“选学”似乎已有必要且十分迫切：“文学名副其实地进入到了选刊、选本时代……这就需要在选刊、选本热中研究当代文学的选学理论以图建立当代选学”^①；“在学术研究上，重视选本差异、重视选家立场的异同、重视各式各样选本生成背后的种种因素，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不

^① 朱寿桐：《选刊选本热中的“选学”思考》，《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可或缺的”^①。因此，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角度对选本编纂体系建设展开系统的梳理、回顾和反思，就不仅有其现实针对性，更具有了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一、当代文学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演变和编选模式的变迁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选本编纂体系建设之间常常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在选本编纂体系建设方面，相应地也可以分为20世纪50—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就阶段性演变而言，50—70年代，是当代文学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探索阶段和一体化时期；80年代，是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多元共生时期；90年代至今，则是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多元分据和深入发展时期。

就选本编纂体系建设而言，50—70年代，其构成较为单一，选本编辑出版数量不多，选本种类较少，文学遴选机制尚不完备。选本编纂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丛书出版的有机构成或作为丛书出版的一部分被规划的，比如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编选的“年选系列”（其中包括“儿童文学选”“诗选”“散文小品选”“特写选”“短篇小说选”“独幕剧选”等），50年代中后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通俗文库”系列（其中包括“文艺作品选”八辑等），6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编选的“农村文学读物丛书”系列（其中包括“短篇小说”三集、“报告文学”四集和“新故事集”一集等）等。彼时，选本编纂出版尚未形成常态化发展态势，受政策影响较大。应该说，当代选本编纂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在80年代完成的。这一阶段虽然只有十年时间，但处于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89—2019）之间，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承上启下的意义。此时，选本编纂出版逐渐从丛书出版中独立出来，成为文学遴选机制的核心构成。选本编纂总体上呈常态化和秩序化发展态势，选本种类格局基本成型，形成了文学年选、争鸣作品选、思潮流派选、获奖作品集、主题题材作品选、阶段作品选、文学大系、教材作品选等几大种类。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选本编纂出版逐步纳入到市场化进程中去，这一方面促进了选本出版的繁荣景象，但市场化策略也带来选本出版的无序状态等问题。

就选本编纂模式看，这三个阶段的选本，经历了从“引导读者”模式、“作品中心”模式到“选家中心”模式的演变。50—70年代的选本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引导读者”的选本编纂模式，主要由三类构成。一类是普及性选本，一类是提高性选本，一类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种种类构成，建基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提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命题。第一类有《工人文艺创作选集》系列（工人出版社），周扬、郭沫若编《红旗歌谣》（有多个版本，以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最具代表性），《新民歌三百首》（诗刊社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等等。这些选本所收入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工农兵，甚至是无名作者。对这些选本而言，集中展现的意义要高于优选的意义。因为，这些工农兵作者很多尚不足以出版单行本，通过对他们的作品的集中展现和有目的、有意图性的编辑，可以很好地建构人民文艺的工农兵主体地位：工农兵作者写工农兵题材。这些选本构成了50—70年代选本的大部分构成。提高性选本也即专业作家创作的作品选，比如中国作协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编选的“农村文学读物丛书”和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1957年和1979年）等；总体上看，这些选本数量不多，入选作家大都是专业作家出身，这些选本与当时出版的大型丛书《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80年代才出齐）等一起充当着“提高”的功能。此外，还有一类是介于普及和提高之间的杂糅性选本，比如说《新人创作选》（中国作家协会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青年作者短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65年）、《1957年诗选》（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1958年）、《1958年诗选》（诗刊编辑部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等等。这一类选本中入选作家既有专业作家，也有工农兵文学作者、文学新人，甚至是无名作者。这一类选本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青年作者短篇选》，其意在于对“文艺战线上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壮大”^②的支持、肯定和推崇，接近

① 王尧：《一个人的选本或“林本”与选学》，《批评的操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页。

② 《青年作者短篇选·编后记》，《青年作者短篇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65年，第285页。

于普及性选本；而像《1957年诗选》等年选，则既带有对某一时段文学创作的检视之意，也是在参与对当前文坛格局的构筑。这里还需注意到，同样是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或委托编选的年选系列，比如说《短篇小说选（1953.9—1955.12）》（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散文特写选（1953.9—1955.12）》（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等，倾向于选入专业作家，而像《1957年诗选》和《1956年独幕剧选》（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等选本，则出现很大一部分工农兵业余作者。这说明，就体裁而言，小说和散文方面的选本，仍主要是以专业作家为主，而在诗歌和戏剧（主要是独幕剧）选本中，则有很多业余作者参与其中。特别是诗歌创作，因为有毛泽东的大力提倡及其对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论断，^①其在当时还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文体，诗歌选本的编选也就难免具有杂糅色彩。

这三类选本，虽然彼此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在构筑50—70年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等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是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文学主线，选取的大都是重大题材，所选作品主人公大都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此而言，选本编纂担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规范的建立，以及读者的引导等功能。彼时的选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引导读者”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决定了选本编纂很多时候，必须要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不仅要“选”和“编”，还要有对入选作品的相关阐释，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阐发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彼时的选本中入选作品，是作为服务于某种观念和立场的次一级存在形态。即是说，入选的作品虽然是主体，但却是作为佐证和延伸存在的。

相比50—70年代，80年代以来的选本更加倚重选本中“选”和“编”的方式。它们凸显的是入选作品和入选作品的选编方式，而不是前言、后记。这使得选本具有构筑文学现场的主动积极倾向，读者不仅仅是被引导的，更可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积极参与到文学现场的构筑当中去，选本具有敞开性特征。此时的选本可以称为“作品中心”编纂模式。关于80年代选本编纂中的作品中心地位，通过对比两个文献可以看出。一个是袁可嘉等人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一个是茅盾的《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表面看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主编袁可嘉，与《夜读偶记》的作者茅盾，在对待外国现代派的态度上，基本相似。袁可嘉所写序言，仍旧延续的是茅盾当时的思路，即现代派虽然不可取，但仍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对于认识腐朽的资本主义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至于现代派的形式技巧，不能从思想内容中分离出来被单独对待云云。但是，我们发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80年代影响甚大，甚至被视为“80年代的文学‘圣经’”。^②这种影响，显然不是体现在其前言或导言上，而是体现在其中的每一篇作品、作品的选择和不一样的阅读语境上。这说明，80年代的阅读早已脱离了前言和后记的限制，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新变。

不难发现，选本编纂模式的转变，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比如说《短篇小说选（1949—1979）》（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2）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3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1980），通过把“十七年”的作品同“文革”结束后的作品并置一起，表达了对这两个时段的作品理解、评价和态度。两个时段作品间的并列编排，建构了彼此之间逻辑上的互相阐发和彼此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作品中心主义，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选本编纂中前言后记的意义往往只表现对作品的阐释，而不是先有一套理念或规范来“选文”。其典型是冯骥才和李陀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这里的“43篇”之名，看似随意，细究便会发现其命名背后所呈现的作品中心主义文学观。这从其选入的作家作品可以看出。其所选虽然都是当时很活跃的作家，但所选作品并非都是入选作家的代表作，比如说刘心武，选的是《电梯中》，而不是《班主任》；蒋子龙，选的是《一件离婚案》，而不是《乔厂长上任记》。也就是

①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

② 参见华明：《品特的“政治转向”》，《读书》2011年第3期；倪文尖：《怎样阅读一首诗：貌似简单的问题》，《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说，所选作品不是思潮流派（比如说伤痕、反思或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它们只是作为诸多个体存在，即黄子平所说的“跳跃着的点”^①和严文井所说的“一丛丛野花”：“我叫不出那些小小的野花的名字。我的最高赞美只有一个字：花！”^②这是以对主潮之外单个作品的肯定为起点的，它拒绝某种预设，也不刻意去命名。《当代短篇小说43篇》在80年代的选本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之后的选本编纂实践，其做法多被80年代中后期的流派作品选编选实践所采纳：比如《1985小说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新小说在1985年》（吴亮、程德培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探索小说集》（吴亮、程德培选评，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6）等等。它带来一个现象，即同一作家的同一作品，往往会被不同流派作品选收入其中。而这种单个作品被多次重复收入的情况，正是作品中心主义的重要表征。

进入90年代以来，选本编纂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正如洪子诚在编选“九十年代文学书系”时所说：“九十年代已过去七八年，有必要通过对文学创作的较全面的回顾，来考察这些年文学的走向和成果，同时也为读者和研究者提示这一阶段值得重视的文本。这不仅是出于及时选辑需要保存的材料这一动机，而且也是为了对我们今天尚难确切把握的‘九十年代文学’的进一步了解。”^③此时的选本编纂，参与文学现场构筑的冲动逐渐消退，更多带有记录、保存、回顾和总结之意。也就是说，这是以选本编纂的方式表达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同社会及人心之间的关系思考，是通过文学来思考时代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努力，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思想史的选本编纂方式。选家的主体性和个性得以凸显，这时的选本可以称之为“选家中心”编纂模式。

前引洪子诚的话，也在某种程度上标示着90年代选本编纂的困境所在：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复杂情势及走向，选家们缺乏应有的清醒而明晰的意识，也不知自己的位置何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90年代以来的选本编纂，大都采取一种观察的方式，而不是构筑或介入文学现场中去。表面看来这是从文学现场后撤，但体现出来的却是选家身份认定上的清醒和意识上的自觉。这样也就能理解，李复威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编选的两套文学选本（即“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和“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在立足点和选编方式上的不同。两套选本从“新潮”到“潮流”的变化，虽只有一字之差，内涵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新潮丛书”虽以十年为期，但不是回顾总结，其同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学新潮之间是一种同构对应关系。即是说，这一“新潮”还在进行当中，远未终结；但这一“新潮”无疑又预设了前进的方向，即趋“新”之“潮”。这是80年代典型的现代性想象方式，选本以对新潮的想象方式展开其编纂实践。进入90年代，这种创新驱动大大减弱。仅从先锋小说的后退就可以看出。诚如李复威所说：“从八十年代的‘新潮’到九十年代的‘潮流’，这称谓上的更换也标示出这两个十年文学态势上的某些差异。九十年代的众多作品群，往往徘徊在文学现象与美学思潮之间。比一般的‘现象’似乎多一点集中的倾向性，较之‘思潮’仿佛又欠缺一些必要的艺术哲学的根柢，故以‘潮流’命名之，较为妥帖。或以题材分类，或以形式归纳，或以方法集中，难以强求一致，只得不拘一格，恐怕也只有如此方能全面展示九十年代多元文学的真实形态。”^④也就是说，正因为缺少“必要的艺术哲学的根柢”，90年代的文学潮流选本，其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把“潜流”构筑成“显流”的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意的人为制造现象，而且这种制造，仍旧具有一种时间上的滞后性。这样一种观察总结式选本，发展到21世纪，就成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百年书系”，诸如《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中国新诗总系》（谢冕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谢冕主编，海天出版社，1996）等等。

① 黄子平：《小说观念突破前行的轨迹——读〈当代短篇小说43篇〉》，《读书》1986年第5期。

② 严文井：《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序）》，李陀、冯骥才编：《当代短篇小说43篇》，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序言第5页。

③ 洪子诚：《九十年代文学书系·总序》，蔡翔编选：《融入野地——主流小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总序第1页。

④ 李复威：《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总序》，马相武选编：《现代寓言小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总序第9页。

二、选本的当代功能与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社会价值

就选本编纂实践而言，其功能和社会价值虽彼此关联，但各有侧重和表征。功能更多是一种预期设定（即编选意图）和“选文”与“选编”相互作用下的综合效果；社会价值则更多表现在选本的阅读接受层面及其社会影响上。即是说，选本编纂体系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其功能为基础，选本的功能设定以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为指归，两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依存和逐步深入的关系。功能的呈现可以在单个的选本中得到表征，社会价值的实现则有赖于选本编纂体系的整体建构，单一选本的影响和社会价值总是十分有限的。

选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横坐标轴和纵坐标轴两个方面。横坐标轴即以下三个层面，展示和遴选功能、辨体（文体辨析）和立典（经典化）功能、传达和表达功能。其中，每一层面功能之间往往不能截然二分，同样，不同层面的功能之间也彼此包容和具有逻辑上的推进关系。这样一种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构成选本功能的纵坐标轴。大体上说，展示、辨体与传达功能，和遴选、立典与表达功能，构成选本功能的两条纵坐标轴。纵坐标轴中，各个功能之间具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之所以做这种区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事实上，选本的功能呈现只能从相互依存的功能的各个层面和每一层面内的各个方面相互作用下的关系值和综合效果上去辨认；其功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系统值：“整体的性质不是从整体以外去寻找，而是由互相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来说明。”^①

首先，展示和遴选功能。这是选本最基本的功能。在古代，选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端，即“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②这两项功能中，“网罗放佚”侧重于集中展示，指向作品，兼有保存文献的功能；“删汰繁芜”则侧重遴选，指向选家，是向选家所提的要求。虽然说，自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兴起，选本保存文献的功能有所减弱，但集中展示和遴选的功能仍是贯穿始终的。具体到每一个（类）选本，还是能看到其各有侧重处。展示和遴选功能的侧重，可以通过“选源”（即“外部资源范围”）和“选域”（即“内部覆盖范围”）^③的比例关系看出。“选源”越窄，“选域”越宽，越侧重于展示。反之，则侧重于遴选。这也意味着，展示和遴选功能的区分，很多时候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相对值和程度问题。比如说，文学年选相较于双年选或十年选，就更倾向于展示；全国性选本相较于地域选本，会更倾向于遴选；主题题材作品选相较于代际作品选（如青年作品选），也更倾向于遴选。

展示和遴选功能的侧重，还因选本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涵。获奖作品集中，遴选的功能（遴选功能已由评奖承担）是微乎其微的，它很多时候只负责把获奖作品集中起来。争鸣作品选的情况，与获奖作品选相似，其遴选功能都不太明显，因为它必须以作品是否引起争鸣作为编选前提，而事实上引起争鸣的作品总是相对有限的，遴选的空间并不大。主题题材作品选中，展示功能多服务于其编选标准，即主题题材上是否切近。至于文学年选和年鉴，展示功能则常常具有建构文学现场的功效，毕竟时间距离过近，遴选过程难免带有选家的主观色彩和现实诉求。相比之下，流派作品选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不仅要考虑到作品的好坏或艺术成就的高低，更是以入选作品是否具有流派的典型性作为指归，如果不具有，这样的作品即使是作家特具代表性的，也要被舍弃。例如戴望舒的《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两首诗代表了诗人 40 年代的风格，但因其“现代派诗”的典型性不足，蓝棣之编选《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时就没有把它们收入其中。

其次，辨体和立典功能。较之展示和遴选功能，辨体和立典功能显然要更深入和具体。就选本编纂而言，展示一旦向某个具体的方向发展，就具有了“辨析文体的类别和体性”^④的可能。辨体功能，某种程

①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厦门：鹭江出版社，2019年，第213页。

② 《四库全书总集类叙》，江庆柏、刘志伟主编：《文选资料汇编·总论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13—114页。

③ 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④ 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度上是与建构流派和思潮相适应的。在古代，如果说辨体功能促进了各种总集（选本之一种）的出现^①，在80年代辨体功能则直接催生了各种思潮流派选本。80年代名目繁多的“新潮”和“探索”选本即此。就辨体功能与选本编纂的关系而言，前言、后记和点评是十分关键的，即是说，选本编纂的辨体功能往往是通过选本之“选”的方式和前言、后记的相互阐发来完成。因为，只选作品，而无评论或评点，会让读者陷于作品的排列之中而不知所以然。评点或评论有利于引导读者阅读，同时也有利于表明选家自己的观念。古代如此，现代犹然。就选本的辨体功能论，其意在于预言或宣示，凸显其建构性；辨体功能讲究的是自圆其说，而不一定是面面俱到或持论公允，否则就达不到建构流派或表达某种文学观的目的。在当代中国，其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这套选本的意义就在于把当时大多数具有共同的“某种倾向”的“潜流派”，“确认”为“流派”^②，由此，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等流派得以命名并确立其文学史地位。

选本的立典功能，是最为人熟知的功能之一。在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选本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非常巨大的。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诗经》《楚辞》《文选》《古文观止》等古代经典选本。立典功能更多体现在“选源”和“选时”（即入选作品分属的时间范围）的比例关系上。“选源”较宽，“选时”较长，其立典功能发挥得越充分，越能选出经典之作；“选源”较窄，“选时”较短，比如说年选或双年选，立典功能就发挥得越有限；这是就程度而言。就彼此的关系论，选本的立典功能是以否定或排斥辨体功能为前提的，因为一旦侧重辨体，就会陷入历史的脉络和流派特征（或“文体的类别和体性”）的共性当中，而不能很好地区分出好坏或艺术上的高低。因此，很多时候，选本侧重立典功能，就会导致文体编选标准的泛化或模糊，比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2008）等。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本着意立典就不去进行文体辨析，因为选本要凸显其“选”和“编”，就势必要分类，而分类就避免不了辨体。比如说蕪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和萧统编《文选》，其所选作品，仍旧是按照文体编排的，只不过其辨体功能是以树典为指归。这里有一个先后和主次之别；而偏重辨体如流派作品选，它也是要选出流派中较有代表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可见，选本中文体辨析和树立典范的功能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和结果的。其区别常常体现在各有侧重上。

第三，传达和表达功能。相比前面两组功能，传达和表达是更高形态的功能。这里的表达不能简单看成是某种文学观念的表达，而应看成是抽象意义上的表达即作为个体（选家）之“我”的主体表达和能动性的建构。同样，传达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灌输，而更多体现在知识的生产上，即通过大家所认可的典范的构筑，以达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及其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可见，表达功能和传达功能的区别常体现在主体性建构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上。传达功能意在知识生产，而表达功能则意在自圆其说、自成一体。对于选本而言，不论是传达功能，还是表达功能，都要通过“选”和“编”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处理选文和选编的关系就成为区别传达和表达功能的关键。上世纪50—70年代，强调选编的理论意义，选文只作为例证，最具代表性的是臧克家编《中国新诗选》。80年代以来，虽然很多选本仍有前言后记，但对这些选本而言，入选作品才是其核心；前言后记往往在于强调和阐释入选作品的合法性，作者文学观念、态度和看法的表达及其主体性意识的表征则体现在入选作品的选择和编排上。比如说《短篇小说选（1949—1979）》，通过把“十七年”的作品和“文革”结束后的作品并置一处的方式，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阐释和互相印证，“十七年”作品和“伤痕文学”作品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相互阐释和读者的阅读中建构起来的。80年代以来名目繁多的思潮流派选本和争鸣作品选，对于建构选家和读者的主体性大有好处。但是，表达功能的强调，也带来入选作品命名的随意和评选标准的混乱，同一作家、作品被归入不同流派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选本，其选家的主体性过强，则可能沦为自说自话，主体性就成为主观性的代

① 参见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65—79页。

② 吴亮、章平、宗仁发：《编者的话》，吴亮、章平、宗仁发编《意识流小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编者的话”第1页。

名词；而事实上，对一个选本而言，选家的主体性并不等同于主观性。比如说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 300 首》（北京出版社，1999），尽管编者声称秉承“严谨的艺术尺度”^①，其编选的个人主观性却是十分明显的。300 首诗中半数以上都是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作品，从其各个时段诗歌作品入选数的严重失衡和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过高评价，不难看出其仍是一部批评性色彩极强的个人选本，而非文学史意义上的较为客观的选本。

在古代，传达多与阐释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诗经》，一旦从诗歌总集变成“五经”之一种，就成为后人不断阐释的对象。相比之下，当代选本的传达功能则要复杂得多：传达功能是与意识形态建构和知识生产结合在一起的。50—70 年代，选本编纂担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规范的建立和读者的引导等诉求，但这里的传达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直接介入式的，而毋宁说是与知识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56、1957 年版），它通过前言的梳理，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诗歌，什么是不好的诗歌，以建立对现代诗歌发展史的正确认识，入选诗歌正是在这种框架下被收入其中的：这都是值得阅读的诗歌作品。这些选本中，当然会有文学观念的表达，但它是服务于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传达的。即是说，传达功能，是以立典功能的实现为前提的；确立了典范，也就确立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与好的作品相关的一整套知识正是在这样一种框架内被最终生产确定，并在以后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增值和得到巩固。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选本编纂是通过正面肯定的方式实现其“选”的功能的，这种正面肯定一旦进入接受层面，特别是集体接受的层面，就会在经典的传承与重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塑造和社会共识的构筑等社会价值的实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经典的传承与重构。经典的传承与重构价值，是选本遴选功能和立典功能的历史呈现。在选本编纂构筑的话语实践中，经典的谱系和脉络一方面会被建构起来，同时也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随着选本前后相继的编选，以前的某些经典作家作品地位会降低，可能会被淘汰，新的经典作家作品会补充进来，地位升高。正是在这个升降继替的意义上，选本编纂体系建设具有了经典的传承和重构的社会意义。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它的出版对重构百花时期“干预小说”和爱情小说的经典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经典的传承与重构而言，选本编纂的意义在于，通过选本中空间上的作品的并置一处的形式建构起一个“共存的秩序”^②，在这个秩序当中，同一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者和不同国家或地域的作者，彼此“共存”、相互作用和互相阐发，它既能使时间进程中后来的作家作品成为“传统的”^③，也能使时间进程中“传统的”的作家成为现代的和永恒的。可见，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化过程，它是一种活的和充满生机的经典构筑，而不是高头讲章和作为遗迹 / 遗产的经典；因为，选本编纂所构筑的话语实践不仅体现在“选”“编”中，还体现在读者的阅读上，是两者所共同完成的。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如果其经典只是以遗文遗物的形式深藏于故纸堆或博物馆，而不是作为不断被传阅和接受的文本，这样的经典，其价值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选本编纂创造的是现实生存形态的经典。它以不断被阅读的方式实现了经典的传承与重构，这是在历史和现实不断对话中完成的经典化。

第二，塑造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④即是说，文化认同是在对“共同”文化的“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体现在文化成员群体间的彼此互认和相互确证上，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正面建构方式，选本编纂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主要体现

① 谭五昌：“序言”，谭五昌主编：《中国新诗 300 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序言第 19 页。

②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11 页。

③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第 411 页。

④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正面建构。选本编纂通过“选”的方式表明其正面肯定态度和积极参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姿态，其正面建构往往是通过经典的构筑、凭借经典的影响力和对经典的阅读得以实现的。二是分类建构。分类建构与选本的辨体功能联系在一起，它不是盲目的展示，而是在辨体和遴选的基础上集中展示。选择什么样的文体，哪一时段、哪一地域或国家的文学作品，对于选本的文化认同的建构而言，是有其区别性和层次性的。这里有群体文化认同和集体文化认同的不同，有民族文化认同和人类文化认同的差异，也有地域文化认同和国族文化认同的区分等。某种程度上，选本编纂所建构的，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认同，它既建构选家所属群体的主体性，也具有区别性和包容性。三是重点建构。选本编纂实践所实现的文化认同塑造，是有其方向和侧重的，其主要表现在所选作家作品的比重和数量多寡上：某一类作品入选数量较多、比重较大，文化认同塑造的方向和侧重就落在这一类作品上。这样一种重点建构，在综合性选本中有集中的表现。比如说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其中所选各个时段、各个地区（包括地域和国家）作品的多寡和比例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认同塑造的不同方向。具体而言，是侧重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对文化认同的塑造而言，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构筑社会共识。虽然说，随着90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的坍塌，共识或“共名”^①越来越成为难题，但选本在社会共识的构筑方面，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说文化认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效果的体现的话，共识则是一种显性的趋同性意向。就选本编纂而言，它通过正面肯定和经典塑造的方式、读者的阅读接受和选编者的编选方式这样多方面的共同作用，能够形成有效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阅读交往行为。这是一种通过入选作品及其入选作品的阅读而完成的“交往行为”。^②就选本编纂的共识建构而言，它是通过选家的编选和读者的阅读在一种“互动”关系和可以“沟通”的“行为语境”^③中所共同完成的。在这当中，经典的构筑是交往双方或多方得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所在：其本身所显示出来的共识内涵为社会共识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其次，它是一种视域融合和承认意向。这样一种视域融合是通过选本的选编方式和读者的阅读共同完成的。作品的选编应该围绕读者，并为读者正确、合理的解读服务。要以读者对选编方式的认同、承认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编选方式同读者阅读的视域融合和意向趋同。再次，选本编纂的社会共识建构具有层次性。具体而言，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群体共识。选本编纂通过其定位，和目标读者的设定，能有效塑造特定群体的社会共识。一种是社会普遍共识。这是更高的目标。对于选本编纂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难题，但也并非没有可能。这就需要通过作品的选择而达到对特定目标读者群的超越，淡化差异，凸显趋同性，其策略体现为以下几点：淡化其身份、职业等不同，淡化政治差异，淡化特定阶段和具体语境的限制，凸显入选作品的经典性及其普遍永恒的面向，凸显经典的文化认同价值等等。

就选本编纂的功能设定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而言，选本编纂实践是一个综合体，选本之“选”，最终总是要落实到“选”和“编”的方式，以及对入选作品的阅读上。即是说，选本是通过选文和选编相互阐释、彼此生发的方式，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发挥功能和产生社会价值的。这些是文学遴选机制的其他层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文学评奖，它意在构筑正面肯定的作品，但如果不落实到阅读，其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和经典作品的典范作用就不能得到体现，获奖作品集正是这个意义上显示其意义和价值的。同样，文学排行榜也是如此。它构筑的一个个榜单和书目，终究要落实到读者的阅读上。

三、“遴选过剩”现象与选本编纂体系的双重性特征

鲁迅指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

① 关于“共名”和“无名”的概念，参见陈思和《无名与共名：百年文学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② “交往行为概念所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解释的核心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③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第115页。

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①或许正因为选本要“更流行，更有作用”，因而为世人所倚重，现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尤其如此。这也导致另外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遴选过剩”现象出现。所谓“遴选过剩”是指文学遴选过程中的“过度遴选”状况，同一部作品被反复多次收入，同类选本数量过多，其结果，“选”的空间和余地不大，“选”的必要性不足。“遴选过剩”现象的产生，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发达和盛况空前，但亦表明其症候和问题所在。

“遴选过剩”现象是就“选”的空间大小而论，这是一种“选”的相对性空间。表面看来，古代文学创作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各种选本累计之下，容易产生“遴选过剩”现象；现代以来，随着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倾向而来的，是创作绝对数量的大幅度提高，“遴选过剩”现象产生的可能性不大。但事实上，“遴选过剩”现象的产生却是与选本编纂的现代转变相伴相生的。现代化程度越高，“遴选过剩”现象越明显。某种程度上，“遴选过剩”现象的产生与选本编纂中的“选”的凸显密不可分。即是说，“选”的空间很大，反而会造成“遴选过剩”现象出现；相反，“选”的空间较小，“遴选过剩”现象则不太可能产生。比如说《文选》和《古诗源》中，收入的陶渊明诗歌，重合的只有两首。在古代，虽然也会出现同一类型的多个选本出现，但长时间的演变之下，同类选本中有些逐渐消失或失传，有些（比如说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则因影响很大而流传下来。这是一种自然淘汰现象，“遴选过剩”现象虽也偶有产生，但不会形成常态。总体上看，古代社会一般不会出现同一类型选本密集并存的情况。现代以来则不同，同一类型的选本中很少有哪个选本比其他选本更权威或更流行，更能定于一尊。有些选本影响可能更大，但并不具有权威性；有些选本更具权威色彩，但影响却有限，常常被同类其他选本所掩盖。比如说朦胧诗选本中，阎月君等编《朦胧诗选》（辽宁大学中文系 1982 年版和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属于前者，而谢冕、程光炜编《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则属于后者。这样一种影响和接受的差异性，常常导致同类选本的反复出现和重复出版，“遴选过剩”现象自是难免。

“遴选过剩”现象，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同一作品被反复多次收入。这主要是就选本编纂与文学现场的互动关系而言。80 年代的文学新潮作品选和文学争鸣作品选属于这种情况。前者主要有吴亮、章平、程德培编“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1989）、张学正等编“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李复威和蓝棣之主编“80 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99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探索书系》等，后者主要有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辑《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 年开始编辑出版，延续到新世纪初）、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读物，198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四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韦实主编《新十年争议作品选（1976—1986）》（漓江出版社，1987）等。就前者而论，作品重复收入，虽有“遴选过剩”之嫌，但对于文学新潮特别是小说新潮的推动却颇有助益。这给人一种印象或效果，即有限的文学创新其意义和影响是非同小可的；某种程度上，80 年代中期被重视高举的文学创新，与选本编纂中的“遴选过剩”现象密不可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通过选本编纂和文学运动的方式造成一种奇观：朦胧诗后第三代诗歌流派的盛况空前。但事实上，很多诗歌流派，都只有宣言，缺少代表作品，或者说其宣言的意义要大于诗歌创作的意义；有些所谓的诗歌流派，一个人就自称一个诗派。但选本的编纂却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争鸣作品选的编选，也是如此。80 年代的文学争鸣现象虽然比较普遍，且大都能形成某些共识，但真正影响较大的争鸣作品并不是太多。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各个不同系列的争鸣作品选中，收入作品的重复收入情况，“遴选过剩”现象比较普遍；应该指出，这种“遴选过剩”现象，对于营造 80 年代的自由批评空间有其积极和不可忽略的作用，不能简单一概加以否定。

^①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36 页。

第二种表现形式，同一类型的选本数量过多。这主要是就文学年选和流派作品选而言。当代中国，文学年选自 50 年代起就已出现，呈常态化发展是在 80 年代，但彼时的文学年选（有些是双年选甚至是三年选）品种并不是太多，且更多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编者大多是出版社或权威学术机构，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中篇小说年选”“诗歌年选”“散文年选”和“报告文学年选”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佳作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青年诗选”和“青年佳作”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教研室（编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年编”）等。这一状况在新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年选更多是个人所为，众多批评家和编辑都参与到文学年选的编辑当中，甚至出现作家（如贾平凹、付秀莹）编年选。单个来看，比如说贾平凹编年选，极具个性，遴选精到，但就整体创作看，每年各个文学期刊（主要是纸质传统期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相对有限，而文学年选，比如说 2015 年就有三十余种，“选”的空间其实不大。时下，与文学年选“遴选过剩”^①相似的，是选刊中的“遴选过剩”现象。近几年来，选刊数量有增多之势，仅就中短篇小说选刊论，就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以及《新华文摘》等。如此，各个文学年选或选刊要想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即单独看每个年选或每本选刊，确实属于精选，独具特色，而且彼此重合率较低；但若把同一类型的文学年选，比如说短篇小说年选的作品集中起来，或者选刊中同一类型的作品比如短篇小说集中起来，再去对照当年度各个期刊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两相比较，总体上看，“选”的空间其实很小：重要作家或活跃作家的重要作品，不是被这个选本（或选刊）收入，就是被另外的选本（或选刊）收入。同时在重要刊物，比如《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当代》《十月》《花城》《钟山》《上海文学》等上发表的作品入选的概率很高。

同一类选本中流派作品选过多的情况稍有不同。从历时性的脉络看，同一类选本在不同时代会多次出现，总体上数量较多。比如说朦胧诗派诗选，80 年代以来，已有众多选本出现，^②总体上看，这些选本，收入朦胧诗代表诗人和朦胧诗代表作品，重复收入作品现象比较严重。就文学史发展脉络看，这些选本对朦胧诗派的经典化和朦胧诗人经典地位的形成有其不可忽略的作用，但从选本编纂的角度看，有些选本，比如说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朦胧诗精选》，却属于重复出版和“过度遴选”，因为，既然出版了《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就没必要再编辑出版一本所谓的《朦胧诗精选》。

第三种表现形式，“选源”较窄，“选时”较短，而选本数量偏多。这是选本编纂的现代性的最为明显的表征。在古代是不可能产生所谓文学年选、双年选之类的短时段的作品选的，古代的选本，一般倾向于朝代选或历代作品选，“选时”既长，“选源”亦较宽。选本编纂真正出现“选时”较短，是现代以来才有的现象。在诗歌选本编纂领域，尤其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阶段选种类的增多，除了各种诗歌年选（或双年选）、十年选、三十年选和六十年选等常规时段选之外，还出现了五年选、二十年选、四十年选和五十年选。二是，诗歌年选品种过多，除了种类繁多的一般意义的诗歌年选之外，还有诗歌民刊年选，甚至网络诗歌年选、网络诗词年选（对于其他体裁而言，浩繁巨大的体量使网络年选难以完成）等等。三是 90 年代以来当下诗歌创作选本越编越厚，数量甚多且过于密集。比如说万夏等主编《后朦胧诗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安琪等主编《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和吕叶主编的《70 后诗选编》（上下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是有代表的三套，都是大部头（32k, 2500 页

① 年选的“遴选过剩”现象，也被称为“年选本的同质化趋向”。参见汪晓军：《文学年选：姿态与容貌》，《出版广角》2004 年第 7 期。

② 比如说阎月君等人编《朦胧诗选》的三个版本（1982 年辽宁大学中文版、1985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版和 2002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版）、中国作协江西分会等编《朦胧诗及其他》（内部读物，1981）、《南风——抒情诗、朦胧诗选》（鹭江出版社，1985）、喻大翔等编《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奇峰等编《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谢冕等编《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孙琴安编《朦胧诗二十五年》4 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洪子诚等编《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杨克等编选《朦胧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海啸编《朦胧诗精选》（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朦胧诗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李少君等编《朦胧诗新选》（现代出版社，2017）等。

左右或 16k, 1300 页左右篇幅), “选源”较窄, “选时”较短, 这些选本更多是展示和辨体功能, 与遴选或立典等功能关系不大。这很容易造成一种效果, 即诗歌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但事实并不如此, 甚至恰恰相反。

通过前面的梳理不难看出, “遴选过剩”现象的出现, 具有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80 年代中后期, “遴选过剩”主要与思潮流派选本和争鸣作品选过多有关; 21 世纪以来, 则更多表现在文学年选系列过多上。这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状况不无关系。80 年代文学是文学思潮潮起潮落的时代, 也是文学争鸣十分活跃的年代。进入 21 世纪以来, 文学思潮和争鸣现象骤减, 相关选本不多, 文学年选异军突起大有取而代之的态势。80 年代的文学年选, 带有一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 主要是由各个文学机构编选, 其编选标准相对保守持重, 先锋作品或新潮作品, 多不被选入。到了 90 年代, 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随着文学年选的商业化趋势而来的, 是文学年选的编选由意识形态机构向选家个人倾斜: 此时大量各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年选竞相出现, 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

应该指出, “遴选过剩”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其出现与选本编纂的现代性焦虑体验密切相关: “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价值的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 然而同时又发现自己处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① 现代性体验是一种典型的短暂和永恒之间的矛盾焦虑体验。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繁荣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现代性“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的期冀和构筑, 但这往往只是量的堆积, 人们发现“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恰恰意味着可能性不足, 作品堆积(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繁荣所构筑出来的景象)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缺失和空虚”, 选本编纂的“遴选过剩”现象呈现出来的往往正是这种过剩和缺失的辩证法。这就是当代文学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双重性特征, 在文学年选中集中体现。文学年选的出现, 是现代才有的产物。古代的选本编纂, “选源”较为宽广, “选时”较长, 可供选择的空间较大。更为重要的是, 循环的时间观下, 使得人们普遍存有一种信念, 即时间的流逝并不构成文学发展的阻力和内在焦虑。现代以来, 这种情况有根本的改变。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 传统经验的失效, 使得人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未来。如此, 文学年选以“年”为单位的计算频率满足了现代性对社会快速发展的想象, 同时, 现代性焦虑体验也体现在: 只有不断地被选入各种选本和重复多次收入, 才能抵制短暂易逝和被埋没的宿命。这些, 都使得文学年选的编选本身就属于“遴选过剩”现象: 它更多具备对文学现场的构筑和对作家的经典化形塑, 却并不太可能完成对佳作的遴选。而对文学年选来说, 不论选家如何不同, 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 即佳作原则。而事实上, 佳作(不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佳作)的选择, 必须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外才能更好地进行。这样一种以年(或两年)为单位的时间距离, 就效果而言, 并不能很好地遴选出优秀的作品来。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之作, 比如说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或先锋派的诸多代表作品, 大都不被当时的文学年选收入其中^②, 即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也看到, “遴选过剩”现象虽带来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出版, 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就其社会价值的实现而言, 没有一定量的选本的编辑出版, 是无法有效完成的。如果说“遴选过剩”现象的产生与选本编纂的市场化有关, 对这一现象的克服同样也可以靠市场化机制部分实现: 同类选本之间和选本种类之间的彼此共存和互相竞争能够有效促进选本编纂格局的优化组合和资源重组。

就文学生产机制而言, 选本编纂当属于文学出版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它与一般的文学出版又有很大的不同, 它首先是一种遴选行为, 与文学选刊、文学批评、文学评奖、报章转载和文学排行榜等一起构成了文学遴选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选本编纂的特征论, 选本之“选”“评”, 及其正面肯定和集中展现功能, 是任何上述单个遴选行为都难以做到的。某种程度上, 选本的遴选功能是文学遴选机制的集大成者和集中呈现。选本编纂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决定了其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远非一般的文学出版(如文集或全集)和遴选机制所能比肩。它既是遴选行为, 又是肯定机制和文学评价方式; 它以“选”和“编”的方式

①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现代性体验》, 徐大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第 23 页。

② 参见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184—185 页。

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观点，既能有效建构文学现场，又能很好地展开文学史秩序的重构。这样也就能理解，何以鲁迅会一边乐此不疲地参与现代选本的编选（编选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草鞋脚》《域外小说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等），一边又痛斥其“选”和“编”所造成的“选域”的偏狭：“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①应该指出，“眼光如豆”是选本所固有的属性。选本编纂的“选源”可以很宽，但“选域”却只能是偏窄，不然，“选”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眼光如豆”说的正是“选域”的有限。

鲁迅的痛斥，其实是从反面对选本编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选本的影响如此之大，编选出优秀的选本就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被提出。这是选本编纂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关键所在。好的选本能带来持久的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样，拙劣的选本，也能导致难以轻易消除的恶劣影响。在这方面，既需要选家们的共同努力，文学生产和选本编纂体系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新诗选本研究”（19FZWB04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8ZDA27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nthology Compil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alistic Reconstruction

XU Yong

Abstract: Although literary anthologies are rough and clumsy, and their status is lower than that of ancient times, their functions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some extent, the history of compilation practice of anthologies is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t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 of keeping records of documents and forming literary classics, but also takes an active part in the literary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scene. Th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ie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s,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nsensus. It is helpful to deepen th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ies, of which is a part of literature publishing system and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th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ies, system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① 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1—422页。